



李小江 主编

华夏女性之谜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书店



D440
26
2

057751

华夏女性之谜

中国妇女研究论集

李小江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宁成春

华夏女性之谜

HUAXIA NÜXING ZHI MI

中国妇女研究论集

李小江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 ·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75印张 305,000字

199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定价：6.65元

ISBN 7-108-00335-X/K·39

目 录

1	代序：妇女研究在中 国……………李小江
13	中国原哲学中的母性崇拜……………萧 兵 ——兼释《老子》“谷神—玄牝— 象帝”组意象群
53	高唐神女：中国的维纳斯……………叶舒宪 ——文化比较与重构的尝试
76	论“七出”之条……………郑慧生
87	贞淫道德纵横谈……………杜芳琴
124	缠足：畸形审美文化心理剖析……………刘汉东
155	论中国女性的法律地位及民族的 法律意识……………李 楠
178	从人口学特征看中国女性地位……………牛楚珠
226	中国妇女参政与女性参政意识……………汪 琦
243	1978—1986：……………乐 乐 社会性解放后的妇女小史
273	对性态度和性行为变化的考察……………深铭
303	现代女性婚姻心理特征……………徐安琪
329	深圳特区社会变迁对妇女就业的 影响……………答 旦
346	上海纺织女工生活环境的健康效应……………罗玉玲

356 | 中国现代化与妇女生活的改变 ……<美>叶玛丽

——离婚的启示

377 | 改革大潮中的中国女性 李小江

代序：妇女研究在中国

李小江

在中国，原是无所谓“妇女研究”的。学术界没有这个课题，高校中没有这门课程，研究院没有这类机构。某些学术刊物上偶有涉猎到妇女的文章，如文学中的妇女形象、史学中的女权运动、社会学中的妇女问题，但妇女无论如何不被看作科学的专门研究对象，更不可作方法论谈。理论界对“妇女”的轻视一向心安理得——她是融于社会、融于“人”的，这种观念根本无需掩饰也无需到潜意识中去寻根索源。

不管我们怎样强调科学发展的自律性，一门学科或一种科学方法在一个国家的出现和勃进，总是与具体的国情和民心所向有关。妇女研究在中国也不例外。

妇女研究之所以在中国长期（主要是解放三十多年来）无人问津，是因为在一块男女空前平等的土地上，无论女人还是男人，在社会生活在心灵世界中，既未曾产生专门研究妇女的需求，自然也缺乏萌生妇女研究的土壤。

五十年代，正当西方世界为平复战争创伤，男人重返职业，女人重返家庭，造成两性角色重新裂变时，中国妇女却大批走上社会参加生产劳动，在男女平等的法律保障下走进一个原是男人的世界。社会的超前认同决定了处于低谷的妇女自觉归同的心理意向和行为趋向——这种情况下，理论上对妇女的抽象根本不可能。即使有人提出，哪怕它在科学意义上是完全正确的，在现实

运动中也会被社会特别是被女人自己视为“反动”。

六十年代，当西方妇女在女性角色复归的压抑中重新觉醒、重新树起女权主义大旗的时候，中国全社会正经历着空前的浩劫：它裹挟着所有的人，也裹挟着融于社会的中国妇女。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政治运动，也无论是城市的农村的有知识的或是文盲，女人未曾因身为女性幸免于难。在她们柔弱的肩上，社会的苦难是与中国男子的同样沉重——这种境遇这种涡流中，不要说专门的女性研究，就是想把女人单独从漩涡中拯救出来也是奢谈——男女平等的政治生活不允许这样做。

还有一种梦：“男人能办到的，女人也能办到。”——这曾为多少代女人梦寐以求，在中国一度成为社会的召唤和女人执着的目标。将女人提携到男人的水准，在一个男尊女卑根深蒂固的社会，对这个社会中卑贱成性的女性，无疑是一种恩惠。女人终于被看作和男人一样的人——这种心理格局下，要将女人从大一统的“人”的概念中剥离出来研究，感到畏惧和奋起反对的，首先会是女人自己。

三十多年来，中国妇女走过了这样一条路：尽管中国贫穷落后，她却在这个社会中分享了和男子一样的社会权利，承受了和男子一样的社会苦难——因国家的贫穷和落后，也因她对社会认同的自觉和深切，她实际承受的苦难较之其他国家妇女较之中国男人便愈加沉重。无论最终意义上是解放的还是未解放的，在这个世界上，正因中国妇女较其他许多西方国家的妇女更早更充分地经历了男女平等的社会生活，她才更深切地体会到平等原则之下女人迥异于男人的甘苦。

中国妇女研究，在社会苦难中觉醒，它出现在十年浩劫之后——这与西方国家妇女研究高度文明的社会条件不同；中国妇女研究的萌生，是以男女平等的社会生活为起点的——这又与西

方女权主义的产床不同。基于这两个特点，已经开展起来的中国妇女研究从起点到发展方向上都隐含着两个超越：它既可能超越社会苦难，将妇女从一般社会问题中抽取出来，尝试做更深层的文化探索；同时，它也可能超越男女平权主义，在研究范围上跨越女权主义的局限，在研究者队伍中吸引女性，也吸引男性学者的加入。除此，妇女研究在中国的出现还具有一种世界性的开拓意义——它在传统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独树一帜，是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理性探索的前驱。面对几千年文明传统和传统科学，面对百余年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妇女解放理论，也面对二十多年来西方妇女研究的实践和成就，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一种新的方法，一派新的学风。

一种新的视角

这是一个“有性的人”的视角。它既不同于传统哲学中对抽象的“人”的泛论，也不同于女权主义对女性“人”的张扬。

所谓“有性的人”的视角，就是在人之存在（而非观念）的基本规定性上还原，从而重新审视人的全部存在。我在《性沟》（已由三联书店出版）一书中阐明了我对人的基本规定性的看法：无论从群体还是从个体，从发生学还是从发展进程中考察，人的基本规定总是体现在三个方面：（1）人是相对独立的生物个体；（2）人是有性的；（3）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任何情况下，这三种规定性总是相依相存，互相渗透，互相制约，同步发展的，没有孰优孰劣孰先孰后之分。也就是说，没有作为生物个体的存在，不成其为人；没有社会属性的生物个体，不称其为人。前者是人类存在的前提，直接隶属于自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后者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属性，是人对自然的超越；而中者

在这其间，恰恰也是一个中介，是人类作为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无论群体还是个体）的具体的存在形式。

但是，长期以来，这三个互相关联的基本规定性，在人的认识中被“科学地”割裂了：

对于人的直接的自然属性，通常是在生物学中讨论，并从中发展了专门为人的实用科学：医学。这些领域历来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在自然科学范畴内，对人的判断，可以相对无视人的社会属性，并力图排除社会科学的干扰，以使之获得“纯科学”的身价。纯科学以不可辩驳的真理性而著称，隐含着对社会及社会科学的轻视。

对于人的社会属性，历来是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学科中分别加以讨论。我们将这些学科统称为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分工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肢解了对人的认识；而在各人文学科共同的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轻视或忽视中，淡化了人对自身的客观态度。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对于人的性征的认识，我们几乎从未做过任何科学的抽象。人们在观念中对“性”的歧视，迫使“性”以扭曲的形式表现自身。其自然的表现，如性病，仍为自然科学中的医学所接纳；而其社会的表现，如两性问题，则长期以来一直放在婚姻家庭范畴中讨论。但是，人的性征的本质，既不完全隶属自然，也不完全等同一般社会现象；它介于自然与社会之间，是沟通并包含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中介。人的性特征，基于自然，作用于社会，同时又在社会进化中得到改造。确切地讲，可以这样概括，作为生物个体而相对独立的人，总是以其特定的性别身份存在于人类社会中。

人是有性征的，抽象的人从来就不存在。有史以来，人，要么是男人，要么是女人，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便先天地预示了他

(她)的不同的性别生活道路，并因此造成了各不相同的行为方式和心态结构。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将“性征”和女人一起封闭在家庭和私人领域，的确可以造成一种“性”与“社会”无关、“社会人”与“性征”无缘的假象，致使“两性”的本来面目发生扭曲。这种扭曲也反映在人的观念中：在无视女人的人格身份的时候，人类不可能正确地评价自身；在无视“社会人”的性别身份的时候，人类也模糊了自身的面目。

如此看来，“有性的人”的视角，不能简单地同化于“男人的”或“女人的”任一方面，它实则是一种包容两性的对比的视角。因而，作这个视角的考察，不单纯地服务于“男权的”或“女权的”现实目的，而是有助于我们对人自身的全面认识。它也是人类在寻求“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阶段。

耐人寻味的是，在对人的规定性的认识中，“有性的”是一个中介，似乎不见其独立领域；但在现实生活中，人总是“有性地”存在着：没有“人”，只有男人或女人，他或她将“自然的”和“社会的”融于其性别身份中，表现为“实在”。而“自然的”和“社会的”反倒成为不见实体的范畴。因此，当我们从“有性的人”的视角切入对人的认识，无形中便造成了哲学上一种革命：它不是唯物的或唯心的论争，也不再是主体与客体的较量，甚至不再拘泥于人自身的感性与理性、智识与心灵、社会与个体的矛盾，而是从“范畴的人”向“具体的人”还原——这是一个实证的、综合的还原。这是因为，人总是以具体的“性身份”见诸自然并参与社会，正是在人的具体的“性身份”中，浓缩着“自然”与“社会”两大范畴。

当代哲学在向人本体回返的迷宫中徘徊，学派观点林立。妇女研究本质上是无派的。它也执着人的方向，但却试图在哲学趋

向“人”的大势中，将贯穿历史的形而上轨道扭向形之下。它不再满足于奢谈抽象的“人类”，而是面对具体的“类人”。正是这种视角，使得哲学贴近人生，理论贴近生活。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这种视角需求首先是来自人生，来自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男人和女人。在中国，正是空前广泛的“男女平等”的社会实践，唤醒了人（首先是获得平等权利的女人）的“性”的觉醒。一种实践所带来的人的觉悟胜似多少理论多少年的说教。在理论界，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张扬着不拘性别高低贵贱的“人”的大旗；而作为“有性的人”的存在，在有性差的实践和体验中，我们不得不向大一统的平等的“人”的概念反诘。

在社会生活中，“平等”曾是还将是一面公正的旗帜，它使得人（无论圣贤贱民）对自身作人看。历史已经证明，当年第三等级伸张平等是针对贵族特权要求平权，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是以白人权利为准要求人权，女人向男人要求权利显然也是以男人为尺度的。可见，所谓“男女平等”在起点上就是不平等的，它的“公正”，浓缩着一个时代的价值尺度的实质：是以男性为尺度并以男性为中心的。

在今天，妇女研究成为研究人的特殊的角度，是历史也是时代造就的。正象历史上男人创造并占有社会，男性中心尺度便成为历史提供的最便当的现实尺度，女人在社会中的历史性失落和对自然的“性角色”的执着，使妇女研究和研究妇女成为当代人剖析“有性的人”的最便当的视角。由这个视角出发，引出了一

一种新的方法

这是一种反省的“证伪”方法。

所谓反省，不同于反思的地方，即在它鲜明的批判指向——

这是一种内省的批判。

迄今为止，所有的人文科学研究，都是沿用着历史的或逻辑的（实证的或思辨的），或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思维方法。它的前提，总是在思想上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占有，是在传统文明建筑的科学框架中反思人类的存在和进化。妇女研究不然。严格地讲，妇女既没有历史也没有科学，她似乎只是一种存在。

如果说，历史仅仅是人类生存活动的演进过程，女人作为人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有史以来，特别是在今天，历史已成为一部史学，以社会生活为场景，以政治沿革为主线，以记录下来和解析过的史实为本并为据。这样一来，与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相对隔绝的女人便整个从历史中消失了。因而，传统科学框架中也没有女人的位置。

女人的存在，只是在现当代妇女走上社会参加社会生产以后，才开始进入“历史”：众多妇女问题面诸于世，使社会搔头，由此唤醒科学的良知；男女两性对生存和共处的空前迷茫，迫使人们反思历史的缺失和科学的缺憾。我在《夏娃的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对此作过详细论述，指出：“随着妇女日益向社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妇女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已经明显意识到：古老的文明并不完美，它只是一个跛足巨人。这不仅是因为以男人为中心的历史观、价值观、伦理观造成了人类意识中心的偏移，更重要的是，它在整体框架结构上的残缺不全。”

长期以来，人类的经济生产活动仅指其社会性方面，即物的生产，生孩子的活动和生孩子的工具女人一概被视作私人活动排除在价值领域之外。所谓政治活动，一向指就社会公共事务做出决断的权利领域，作为群体的女性与政治及政治学说无缘。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对于妇女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未载史册。但是

如今，当妇女肩负社会生产的同时肩负人类自身生产，她的双重生产性质应该如何认识？当妇女走进公共生活；把许多传统意义上的私人问题带进社会，政治概念及国家机器应该如何调整？对此，经济学和政治学说没有作出理性的回答，任凭“问题”在现实的轨道上我行我素的发展。从这些“问题”的意义上反省历史和科学，体验到的也不再是一种高于芸芸众生之上的哲学的超越，而是对人自身的残缺认识所造成的切肤之痛。

毫无疑问，这种缺失和偏颇，都是因为女人的历史性失落，它造成理性科学对女性的疏漏。正因此，人类在力图完善自身、科学在立图求真的过程中，不得不做自我反省；它不得不以女性主体的身份向历史和科学证伪。

由此可见，妇女研究的方法不仅是历史的和逻辑的，更主要的是证伪方法。它要以女性客观的历史存在和女性主体体验，对以往所有被认作人文科学公理的“ALL YES”说“NO”。

证伪方法，是从现代自然科学中借用或称转用来的，它试图用科学的界说使“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伪科学成为真理。

在科学发展史上，人们在普遍接受牛顿定律以后很长时间，将其视为客观世界的绝对真理企图放之四海。十九世纪下半纪出现的“麦克斯韦妖”现象，在科学界造成空前骚动。此后，相对论的提出和量子理论的诞生，正是因“骚动”而来，它们用证伪的方法，在批判牛顿定律泛科学化的同时规范了牛顿定律，使之成为在某一特定范围内和某一特定条件下的绝对真理。显而易见，证伪的方法应人类认识不断深化、伪中求真的需求而生；在认识上证伪，使得观念中的真理变成实用的科学。

同样，证伪方法以妇女研究的面目界入人类科学，是应入类深入认识自身的需要而生。它使长期以来只是在哲学上讨论的那种抽象的“人”还原到活生生的女人和男人，使我们得以从抽象

的“人”的概念切入具体的人生。这无疑是一种哲学革命。通过这种革命，我们不仅能够在观念上超越人生，求证人之存在的社会价值；而且能够直面有形有性的人，在现实中直接占有它的生存价值；并驱使那种适合于一切人（在认识上）却人皆不可用（在实践中）的人文科学成为一种为人生服务的工具。

这样看来，所谓“证伪”，不仅仅是从女人的立场出发去证明以往人文科学中“不真”的成份——这只是妇女研究为科学服务的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向已成规矩的“人”的所有的生存价值证伪：它用无条件的生命价值（女人赋予并执守），向无限度的物的发展证伪；它用非社会范围的私人属性（与女人一同被贬抑），向僭越的社会标准证伪；它用无可救药的对情的执着，向诸多价值观念本身证伪；甚至，它用为美并唯美的人生，向生的真与善证伪——它并不企图推翻什么或否定什么，正象对牛顿定律的证伪不是否定而是矫正——它清除对抽象的“人”的宗教膜拜，力图扶正因粘附了过多的价值虚饰使中心偏移了的人类航船。只有通过这样的证伪，人们才可能自觉地抛掷在精神上思想上意志上背负着的越来越沉重的历史包袱，较为轻松地生活着感受着思考着和继续向前探索。

当代世界已经并日趋是一个男女全面共处的世界，任一性别中心的尺度都不再适用于当代的男男女女：传统的男性中心社会标准不仅女人用得蹩脚，它同样也不再适用于要与女人全面平等共处的男人。对此，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上却较全面地享受了平等生活的中国女人和男人已有深切的感触。因此，它的证伪的指向是双向的：既有向传统文明的反诘——它批判男性中心文化；也有对妇女解放的质疑——它矫正女权主义偏差。正是这种前提，使得妇女研究在中国形成了——

一派新的学风

所谓“新”与“旧”，不是截然对立可以断然分开的，它们总是相对而言：相对于历史，相对于传统，由“这一个”相对于“那一个”。因此，对于“新”或“旧”的判断，往往是事实自己站出来说话。

中国妇女研究的新学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女界，中国知识妇女对妇女问题的自觉介入，拉开了女性理性自醒的序幕——这是相对于中国当代史和当代妇女史而言。1985年夏，在郑州首次召开“妇女研究座谈会”，与会者大多是女性，较早地涉猎妇女领域并自觉转向妇女研究的，是一批中青年知识妇女。

解放三十多年来，在男女平等的立法环境和思想氛围中，女人融于社会，总是极力淡化女性特征，向男性中心社会尺度自觉认同，其中又以杰出女子为最。在知识女性跻身学界、翘首期待学界证身的心理定势中，往往是以诋毁和漠视自身性别身份为前提的。如此去做，确有所得：在多重人生角色中充分挖掘了女性的潜力，显示出女人参与、影响、创造世界的能力；也有所失：在忘我非我的性角色认同中，造成女性主体意识扭曲，是空前的生的艰难和心的沉重。正是这艰难和沉重，唤起一代知识女性理性自醒。她们终于在“无性”的学界张扬起一面“有性”的旗帜，试图以女性主体身份去审视整个历史和以往所有的学问。

其二，在学界，它打破了研究者的性别界限，不拘学科，不拘学派，独具一格——这是相对于已经有了二十多年历史的西方妇女研究而言。“妇女研究丛书”（我国第一套以妇女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大型学术丛书，河南人民出版社）的作者队伍，是有说

服力的一例：男女几乎各半，议题讨论中，没有任何性别派别之争，使旁听的西方学者愕然。

我们已经知道，西方妇女研究是六十年代新女权运动的直接产物，它也是女权主义一个理论组成部分。在现实运动与文化运动合流的大势中，它逐渐吸引男性学者的介入。尽管如此，理论对话中，仍然难免两性交锋的冲撞和抵牾。而在中国，正因为妇女研究是男女平等的产物，它才能在一个两性患难与共的起点上，超越任一性别利益的局限，向历史向文化溯源。中国的妇女研究，较多地偏重社会文化研究，它从女性的角度切入，获得的却是一个包容两性的“有性的”视角。这样一来，无论是反省、批判、证伪，唯一可行和唯一正确的方法，只能是两性参照互相比较的方法：失此必失彼，求此求彼方能求全——不仅是为了周全科学，更是为了完善现实人生。因此，较早地介入妇女研究领域的学人，无论女性或男性，更多地背负着人的使命（不尽是科学的使命），执着于人的探索（不尽是理性的探索），从而将科学和理性的锋芒更紧地贴近人生（不尽是抽象的人）。

其三，在世界上，妇女研究在中国的出现，预示着社会主义方向上（包括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妇女运动和人文科学发展中一种新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要么因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要么在民族独立解放的同时，通过立法形式确立男女平等，给这些国家的妇女带来了空前的社会解放。这些国家的妇女大多与中国妇女有相似的经历：未曾经过女权主义大潮的冲击，缺乏女性自醒的思想历程。她们享有西方妇女梦寐以求却难以求得的社会权利，却缺乏女性主体自主自立的觉悟和勇气——她们以为她们在被社会认同和自觉同化于社会的过程中解放了，但“解放了的”切身体验却不尽然——这是我们曾经有过的共同的体验。何

去何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妇女都会做出自己的回答和选择。中国妇女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探索，无疑将为这些国家的妇女提供一种借鉴，它也为正在深入拓展的西方妇女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

余下的话，便是关于这部集子了。这部集子是一个结晶，是在组织写作“妇女研究丛书”过程中俯拾到的一些精品。

我在“妇女研究丛书”自序中讲过：我们从事的研究，其基本特点，即中国的。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中尚有许多谜团，中国女性乃谜中之谜。谜不是什么国宝，它是封闭的一种表现。打破封闭，揭示中国之谜，正是中国学人义不容辞的职责：这不仅是为民族文化正身，也有助于扩大人类自我认识的视角范围。这部集子仍然试图在妇女研究方向上做这种揭谜的尝试，故名“华夏女性之谜”。

既然是趁熟落之势拾到的果实，难免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集中的论文，篇篇有长处，却不能包罗万象；涉及一点，也不会是终极结论。有一点用心是可以直言道破的：它只是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有性的人”的视角，用一种新的方法——反省的“证伪”方法，行一派新的学风——不拘性别不拘学科不拘派别的学风，去重新审视历代国人沉溺已久的传统和我们共同面对的现实，在科学领地吹一股荒原的清风，以期将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推向深入：看得清楚，便活得轻松。

至于文中观点，自然各异，任今人后人评说。